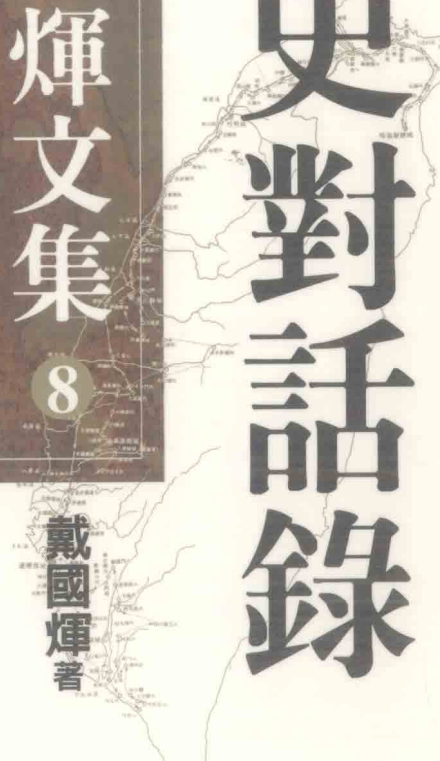


台灣史對話錄



戴國煒文集

8

戴國煒 著

戴國煇文集

8 台灣史對話錄

戴國輝文集【8】

台灣史對話錄

作 者——戴國輝

總 策 畫——王曉波

主 編——林彩美

執行編輯——陳淑美・李佳穎・洪淑媛

封面設計——唐壽南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發 行 人——王榮文(遠流)・魏德文(南天)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電話◎(02)2365-1212 傳真◎(02)2365-7979

郵購劃撥帳號◎ 01894561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14 號 1 樓

電話◎(02)2362-0190 傳真◎(02)2362-3834

郵購劃撥帳號◎ 01080538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四樓 505 室

電話◎ 2508-9048 傳真◎ 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 2000 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2002 年 4 月 1 日 初版一刷

全套售價◎新台幣 6000 元 (套書不分售)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4586-8 (套)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南天書局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總序

一、必須的交代

1996年3月17日，著者攜伴內子自東京返回台北，爲的是同月23日的總統選舉，行使我們夫婦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台灣政治上的投票權。月底，我提早一年向勤務學校立教大學申請退休一事，獲准。繼而5月17日返鄉定居。終於對流浪四十又一年的日本學界生涯，告了辭。同月20日，我參加了在桃園舉行的第一屆直選總統就任大典的同日，既是偶然又是必然，更可能是「奇緣」，筆者被安置於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就任諮詢委員。此「特聘」職位並不屬於特任官，故離職時不支付退職金。只規定一年一聘，與總統同進退等。係我在台正式任職的第一遭。某博士同事君，有一天自嘆而云：我們的職位「妾身不明」，頗爲中肯，引發相關人士的共鳴。

有關職位的小插曲還可談其一，二。在我就任的第四日，受邀到台大演講。講題爲「光復後的歷史經驗與台灣知識份子」。結束前的討論過程中，有位年青朋友起而質疑。他說「戴教授，你以前是政府黑名單人士。爲何？返台來還要搞特務這一行業？」。顯然，他是把「國安會」與「國安局」混爲一談。記得6月17日早上，時任國安局長的殷宗文上將（現昇任爲國安會秘書長）來訪，是我們頭一次的會晤。閒聊

中，我把前述台大演講會的軼事介紹一番。殷局長回答的頗為乾脆：「我們國安局只有“情”而沒有“治”，一切依法行事。」我立即搭了腔，「那太好了，希望局長能多向外作些 publicity（公關），並非“宣傳”（propaganda），讓一般老百姓能有所釋懷……」。第二類小插曲該是屬於大眾媒體界的習氣。一般而言，我們台灣的媒體，與一般社會人士的「思考模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人人認為官位優先且重要於學術地位。每一次在媒體出現時，總需要叮嚀再三，「我不能代表官方（國安會）發言，只是以學者個人身份表示一點未成熟的看法而已。若有需要標誌頭銜，請用立教大學名譽教授抑或政治大學、文化大學兼任教授便夠了，謝謝！」。但效果一直都不彰，甚至於有些報紙還代著者另設「國安會研究員」等之職銜，真叫人啼笑皆非。

任期第一年之前半，因我少年離台老大回，難免惹發些許不適及困惑之累。因遷家、搬書（十八噸貨櫃之量）及適應新生活而忙。上班時繫領帶，穿着西裝革履係夠拘束的。後半，則是掙扎於建構非我專業的「國家安全保障」有關概念，而不得不陷於窘困境地。在台灣，要找出相關日文文獻是相當不易的。

經過大約七、八個月之苦思，建構了研究主題架構的雛型。繼而邀約數位同好之士，組成小型「日本綜合研究會」。主題則定為「五十五年體制崩潰後日本的綜合研究」。研究會的運作逐步上了軌道。在此過程中常感有「現實政治的所需」與「學術研究之本質」間有難於彌補的落差。

雖然，著者搜集與收藏不少日本文獻，但其主要者卻是與歷史相關之類。難於對應日本現況研究之廣泛需求。除了運作研究會以外，又得花上相當多的精神，代我研究同仁搜集相關資料和書籍，倍感吃力。

又過了幾個月，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隈丸優次秘書長（1999年4月調任駐聯合國日本代表團公使）前來總統府向我表敬訪問。外交禮數上有需回拜他的頂頭上司後藤利雄所長於新光人壽敦化大樓之該協會。

後藤所長，原本相當被期待及看好的歐美派職業外交官，後因長期患病而耽誤了昇遷。遂被改派為駐韓大使。他自韓國退休後，來台就任交流協會台北所長。駐韓時期與我老友小林慶二朝日新聞駐韓支局長成為忘年之交。

1996年3月上旬，小林打個電話到我日本家中來，說他已自『朝日新聞』社退休，轉檯到九州國際大學就任教授。將主持東南亞華人、華僑問題的研究，能否幫他物色台灣的適當學者與他合作，我立即回電給他：「當然可以，我17日即將返台，準備參加總統選舉的投票，社會氛圍滿熱鬧的。若能與老兄在台北會晤，我擬找幾位好友與你見見面，方便你們相互討論合作有關事宜。如此，既快又省事不知高見如何？」。一言為定，3月17日晚間我們倆人在台北晤了面。

記得，小林參觀選情後，還給我惡補了台、韓政情之比較分析。隨後他邀我一同與後藤共用午餐。雖然，在高雄召開的「亞洲公開論壇」（1995年）會場上，我曾與後藤打個招呼。僅是點頭之交。

交談後，深感他是一位正派君子。其不亢不卑的談話態度及拿捏十分穩當的談話內容，又帶給我新鮮感。返台以來，偶爾有機會參加歡迎所謂親台日方人士之集會。有時會碰上，真是不識泰山，又「盲目」囂張頗難入流的一類日本人，尤其不入流的學界人士，目中無人，開口閉口試圖訓我國人，還不遺餘力地說些大話，甚至會誇口說若無日本的支援，台灣甚至中國大陸都難得支撐下去似的。這些日本人真是不可救藥

的，既單純又粗獷的「政治細胞」，根本不值得行家一談。

俟我小圖書室整理初成的1997年夏天，我開了個小家宴。除了邀請後藤和隈丸二位日方貴賓外，我們還邀了國內數位有識之士相聚交誼。後藤參觀了小圖書室後，他說「能否借些給交流協會，我們剛開設了〔日台交流中心〕，書架尚且空空的」。後藤的話，當然是一種戲言，我倒向他提出要求請他們的中心儘速能把年鑑、統計書等基本資料類補足，方便研究者訪查及利用。

日本人，有些的確是夠單純，又素樸，更患有欠缺「政治細胞」的通性。其國民性既是易興奮又具有偏走一邊倒的通病。在明治天皇神格化成型以來的舊權威影子下，不同聲音仍然不易彰顯。日本社會的同質性(homogeneous)頗強。它狹窄的日本神國思想及自三〇年代迄敗戰為止的大和民族優秀論之歇斯底里症候群，既教人恐懼又難忘。

近幾年來亦步亦趨的日本式新保守主義的風尚，將向何方走？有無重新轉向為軍國主義老路子之可能？連非左派的日本自民黨大老們（例如後藤田正晴前副總理及宮澤喜一前總理暨現任大藏大臣）都一再地表示憂慮。筆者返鄉已滿三年有餘，真不知為何我們朝野人士會對日本的右傾化現況懷有那麼樂觀的認知及對待態度？

今年（1999年）6月間，筆者受邀赴日演講及參加「評審申請獎學金的亞洲留學生會議」。順便造訪『外交論壇』(Gaiko Forum)誌的前總編輯近藤大博（現已退下，任同誌之編輯顧問，並轉任日本大學大學院總合社會情報研究科專任教授）。主要目的在於致謝他4月間及時航空寄贈我奈伊(Joseph S. Nye, Jr.)的新著『髒手』(Dirty Hands)一書。

『外交論壇』係日本外務省委託民間所辦的雜誌，標榜著「出錢不出口」的原則。其實，那一類美麗的「看板」是難於被遵守的。我有位年

青朋友武見敬三君，他是現任參議院議員，被小淵惠三總理提拔，獲任外務政務次官。他專管亞洲及中國有關事項及國家安全保障問題等。

近藤編輯顧問與武見外務省政務次官具有密切關係該是不必贅言的。我老友近藤當然知悉我與武見自他學生時代以來的老關係。在某個場合，近藤告知武見，筆者即將訪日一事。武見念舊，要我留個時間。雖然當時國會尚在會期中，他非常煩忙，但極願與我面晤詳談。

武見敬三議員，是日本醫學界「龍頭老大」故武見太郎的公子。武見太郎與我恩師東畑精一及我私淑良久的松本重治國際文化會館理事長三人是吉田茂周邊的三賢人。他們三名，生前都夠格被稱頌敬重的在二戰後「日本知性」的三大風範。

敬三君，大三時立志升學研究所。他自幼稚園一直念到大學部，一

貫地在他父親的母校慶應大學系列學園接受教育的。不僅如此，他還是慶應大學橄欖球校隊之好手。

眾人皆知，日本名校例如早稻田、慶應、明治、法政等校的橄欖球的校隊，頗近似於職業性球隊，練球時間之多及猛是有名的，那有多餘的時間鑽研書本，貪睡是生活的常態。武見君有意願念研究所，教他父親高興得合不攏嘴，於是他父親找上了上述松本重治老先生商談。松本原是新聞界的名士，曾經在其「同盟通信社」（日本最大的



武見敬三到寒舍來訪（1997年初春，東京，杉並區）時留影

通信社，現共同通信社之前身）上海支局長任內（1933—1939年）的1936年，曾經報導有關西安事件的全球獨家新聞，揚名一時。松本一貫地認為，未來的亞太地區的和平及安全，全繫於能否把日、美、中（包括大陸及台灣）三者間搞好既平衡又和諧的關係上。他鼓勵敬三研究中國問題。筆者本不認識敬三，松本重治遣其長男松本洋兄（現任國際文化會館專務理事）攜敬三叩我家門，洋亦是我老友，是一位留英的都市計畫專家。筆者云，我與慶應大學關係不深，但很願意盡我棉力。斯時，我獨自定位，承擔「提燈者」，只伴走敬三之半步前便足夠。武見太郎，某一天帶上名酒訪我茅舍，向我們夫婦鞠了一躬道謝。以「明治人的傲骨」享譽於日本的名士，不嫌棄更降下身段尚對我等晚輩致如此般的禮數，教我終生難忘。

1999年6月17日下午，我探訪武見於參議員會館五一二號武見敬三事務所。會晤時間約為一個小時。有關本序文的部分對話特此公開，以資諸賢參考。不過，這些都是憑我記憶的大意，文責當然由我自負。我說：很忙吧！日美防衛合作新指南相關法案，剛通過，你又得為小淵首相7月上旬訪中國大陸事而忙。他答說：還好。武見亦問及明春的台灣總統選舉相關敏感問題。因未得他的承諾，恕我在此不便公開。我相繼亦說「自5月19日下班後，我已離開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現在是“無官一身輕”，訪日又不需請假，自由一些了」。他答腔，「那太好了，你將返東京來？」我說「不，我準備返回台灣的學界。」日本的知心朋友們，先前都知悉，我返台定居的初衷為何？在台灣，筆者為了一些顧慮，不曾公開宣明過。其實，我本來所設想的是，模仿日本的國際文化會館，在台北設一個附有特殊文獻圖書館的國際交流中心。但經過這三年的台北經驗，我已不敢抱有任何幻想。除非我自己能創設一個基金

會。目前，在台灣能見到的社會現實，確是彌漫了功利主義及既短視又自私的社會氛圍。若能洞察實際政治運作的軌跡及實質，人人都可體會到，目前的台灣係難有催生並維護具有大本領真學識的傲骨人士之公共空間。要作好明哲保身，迴避奴氣和媚骨，不自陷卑微之境地已是相當不容易了。

早有朋友警告筆者，「你有話直說的性格不適於“作官”」。又有知音者說「你常會把事情點破。點到為止，已教人夠難受的了」。活躍商場的一位親侄，甚至說出「叔叔，你的一板一眼作風，在日本抑或德國，人家會肯定你的，那該是屬於誠信一類的。但返台來了，說話留些餘地及曖昧些比較好」。學界朋友亦勸說「老戴，何必那麼認真，吃力不討好的。太認真中國史上是留不下名的。你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是夠叫你疲倦的吧！」等等相勸美言。

著者，呷著日本綠茶，聆聽他如何支持若林正丈組織「日本台灣學會」等事。上述一些勸言及其給我的感觸一直在我腦海中不斷地迴旋。

在日本四十年的學術生涯的筆者，雖然卑視某些不正派人士既高傲又小格局的作風，但我對正派學者的敬業性、笨工作法是肯定的。日本學界鮮見中國式厚黑之學以及馬基雅維利主義等的橫行又是我所贊揚的。

著者參觀過日方設立在東京和台北的「日台交流中心」，並已收到該中心所編的『台灣關係圖書目錄——1997』（1998年7月發行〔非賣品〕），瀏覽後真教我驚訝！短短三年多（自1995年10月—1998年6月）他們之中心，已有如此般的成果。後藤利雄（從台灣返日後接任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理事長），只是為負責，在發行者處標了名。但同書的序文根本見不到他的大名。我們捫心自問，台灣的官員們，到處為建築

物題字，爲官方出版物寫序文（大都是秘書們代爲捉刀者），到處剪綵，到處爲人證婚，到處做些與他本人根本無關的「專題演講」，或許是著者的孤陋寡聞，我不曾讀過任何媒體，亦沒有見過任何有識之士，向這些外華內貧的官場文化提出質疑，不無天下大怪事在台灣闊步橫行、大行其市之嫌。官員們不可能是孫悟空，那裏還有多餘的時間去看書。那有可能坐下來，以鎮靜的心情去沉思治政之道。

全台灣住民都該知道，日本對我們而言，是僅次於美國的重要國家。光復以來，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我們在台灣依然找不著夠水平的日本研究機構。當然也找不出像樣的有關日本文獻圖書館，抑或資料中心。這些窘境和怪事，難道不值得我們有識者去關切及質疑。

當筆者向武見議員告辭時，他說了二句話：「我們期待着台灣能出現夠水平的日本研究，也盼望戴先生，您能多自愛及多保重！」。我重新確認，我個人當今迫切需要的是「時間」，是「自由」。爲了獲得屬於我自己的「時間」及「自由」，我有需要重新樹立我自己的主體性，並掌握住我自己的「座標軸」。爲重尋我的「夢」，在我內心深層將高揭全新的挑戰大旗。

二、有關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方法暨切入視角試論

（一）為何要特別劃定「台灣近現代史」為研究對象？

1. 本人的思考和方法與時髦、應景無關。早於1978年以前，在日本醞釀創設「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可以佐證。

2.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簡單地可以歸納爲二。①整理相關「空間」（在此即是「台灣」）居民生活的歷史。②並認知相關居民的歷史經驗，包括正負兩面及心性「比較接近法文的*mentalité*精神、心理狀態、思維方法。在我的感受上，是與英文的*mentality*有些許差異的」。

3.著者早認爲自鴉片戰爭（1840年）迄今（1999年），以「台灣」爲名之地理範疇的居民，所經歷的生活歷史及歷史經驗頗特殊，值得我們更深一層地去探討。

4.任何社會事物都是某個時間與空間的產物。因而我們有需要把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之相關時、空的定位劃定清楚。不然容易陷入泛泛之談的境地。故在此，我們把台灣近現代史之空間鎖定爲「台灣地區」，時間的斷限（區分）暫時劃定爲鴉片戰爭（1840年）迄今（1999年），以便研討。

(二) 台灣近現代史期內的分期（時代區分抑或時代斷限）

務必再把台灣近現代史期內再分爲二期來思考及追索：

1.前期：晚清～日據（1840—1945年）

2.後期：光復～當今（1945—1999年）

(三) 當為地理範疇的「台灣」的內涵該釐清

台灣之詞，本來是泛泛之地理名詞。我們爲了學術研究有需要給它賦予社會科學的真正內涵：

前期（晚清～日據）：以台、澎爲核心的相關島嶼。

後期（光復，尤其國府中央遷台迄今）：台、澎、及金、馬諸島嶼。

(四) 居民之結構分析及其各自生態之具體掌握，亦該是研究之一個大前提

前期：

1.自大陸被清朝派遣官民的出身地及其背景之分析不可欠缺。眾人皆知，此期間科舉及第官員不能在其故鄉就任官位，另外斯時的地方山頭主義比當今更甚，值得考量。

2.原住民（當今的政治和法律用詞，著者不甚同意此種稱呼。理由甚為簡單，目前被法定的原住民身份在人類學上通常被分為九族，九個系統。他們相互間之語言、社會組織、以及宗教、生活習慣等有異。用何種標準來劃定原住民，是我質疑的焦點。筆者認為，以先住系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來稱呼並敬重他們為宜）。

3.平埔族，被漢化較深的先住系台灣人。

4.福佬人（其實內部又分為二大類，漳州人及泉州人）。

5.客家人，以所用客家話之種類又被認為有四縣、海陸、饒平三大類，另得加上福佬客（具有客家意識，但不會講客家話的「原客家人」）。

6.殖民方的日本人百態，日本人的個人之善意及日本帝國主義體制的作為該區隔來看待。

當今的台灣社會，情緒性反彈，泛政治化或意識型態化的狀況相當嚴重。學子多是只為取得學位而念研究所。學術研究已陷入獲得學位，佔據職位的手段。這是個不健康、非正常的社會。於是，著者特別強調，我們宜於先從事物的表相切入，並加以比較分析。如此般較易弄懂社會事物的本質。

後期：

1.唐山（又稱為長山，本為尊稱）→阿山（罵詞）→半山（賤稱）之變化。

參照：狗仔（日本人）、四腳→三腳→雙腳（係真正的人＝本島人，即是今日的台灣人）。日本人「有禮無體」，日女穿和服時不穿內褲，日男之「兜襠布及裸身而行」的日常習慣，台人視為野蠻，加上隨地小便之陋習，因此罵日人為狗仔。此種個人低層次之情緒發洩，雖然改不了大狀況，卻是小市民喜歡做的無奈性或世俗性之「小動作」。

2.在當今省籍矛盾的無限上綱及逐漸消褪之社會背景下，自有設身處地＝生活者意識來正視，並凝視歷史事物之重要性是不必贅言的。

3.外來政權概念之形成、普及，當今更有一般化的傾向，其虛實與其背後的邏輯有需要慎重考察。在此，著者特別得指出，我們的大眾媒體不夠成熟，欠缺背後（景）分析之功力。形式上的抄襲與比較到處可見。有關此類缺陷，學界之作法及雰圍，我們學界人士該不該肩負部分責任，又值得我們相關人士省思。欠缺主體性的消化，融合外來事物能力時，那來的自我認同(ego identity)的落實暨自我尊嚴之回復及擴充。自我尊嚴無法樹立時，又有何可能談及自下和自內推行改革，變革、革命等之社會性課題？

(五) 族群性(ethnicity)概念在社會學及文化人類學領域的風行 與台灣學（包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諸多領域）

日本人的例子（省得著者撈過界，本人只報告日本之例子）。

愛奴人（先住民）——和人（日後演進為日本民族之主流勢力）——外來僑民（韓、華〔台〕僑等人）。

古基層文化——大和文化（日本文化）——外來（新來）文化

多元化及國際化——促使日本學界重新揀出老問題，研討新課題的新動向，著者甚早（1973年夏）在日本便提出「日本內在的亞洲問題」的新視角。日本人所常提者為「世界中的或亞洲中的日本」。他們藉此來設定自己的問題，頗欠缺內在性的自我對話。日本人雖然喜歡談反省，但其反省多時卻自限於圈內，是不夠徹底的另外一個原因，該與他們既收斂又封閉的社會性格有關。同質性的對話，頗難突破「老套」，原因在於不擅長聽取不同聲音並經過社會的內在對話中尋找自我成長之作法有關。

台灣社會的轉型，亦迫切地逼着我們社會秩序的重建。它的課題不外是「短暫性的新國民意識」的打造暨架構。它又可解讀是為台灣地區住民謀自保的過渡性「概念」之一種架構工程。

因為有此類社會需求，學界受到了時潮的沖擊，為了因應，迅速地開展，並展示如何自「居民結構」的視角來探討「何為台灣人」、「何為台灣社會」、「何為台灣文化」等之緊迫性課題。尤其對掌握票源之所需，其緊迫度在政界，比學界要來得高，係不必贅言的。因而，政界人士忙著高喊「本土化」的口號，但甚少人會去深究所謂本土化的真正內涵。探討的捷徑確在於「史實與現實」間的相互往還中，既是雙管道又該保持平衡的層面上，同時著手推行為適。

台灣社會當今的雰圍，一方面「台灣民族論」已快速地失去市場。另一方面因抗拒中共過台海之民意高漲，排拒「中華民族主義」，抑或「中國民族主義」的社會輿論亦隨而形成。其往後的去向是值得人人關注的。

為了支撐上述輿論，政治家抑或政客們，尤其屬於民進黨系及台獨

系的人士，面臨着新的挑戰。他們更是爲了因應對「福佬沙文主義」一類的反彈，有需要伸張「原住民」在歷史及現實上所以存在的道德正當性。由而他們再也不能以同化論來對待弱勢「少數民族」。特別，能獲得執政的「美夢」，看似可伸手便得的近年，省籍矛盾的提法顯然既是落伍，又是不合多數選民的胃口，代而被提示的係族群間的相互尊重及和諧。不過，大和解的提法作「秀」成分有餘，欠缺理論及學術根據多是有識者皆知之事。

族群(ethnic group)概念在台的風行，其實有其現實政治的背景。原本出自美國學界的族群概念，是與當今全世界規模的少數民族、弱勢族群、弱勢種族們的自我覺醒、自我主張等的訴求是有密切關係的。基本上是弱勢人群對優勢民族、人種和統治集團暨權力中樞所發出的「獅子吼」。兩者之間存在具有一脈相通的時代精神。

同時，我們又不該忽視 ethnic group 之集團訴求，與其渴望保持自己族群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及「血緣的宿命屬性認同＝頗難更改的認同」，亦是通底的。族群和諧背後所存在的原理性，暨本質性問題——類似族群間之矛盾及利益衝突，暨族群糾葛等——亦該是我們台灣近現代史研究課題之一部分。因爲它具有其歷史脈絡及背景之故。

若要築構「台灣學」的話，我們亦可藉族群概念來剖析台灣當今社會，甚至於又可延伸去構思「在台灣如何建構族群之社會學」的一類新課題。

(六) 光復後的居民結構

1. 光復隨後～1949年底，可分如下幾個子題來研討：

- ①本島人（灣生仔，出生於台灣的人，為當年在日台灣籍華僑之自稱）的自外復員與分歧
- ②漢奸及半山之虛與實
- ③台灣人概念抑或稱呼的萌芽
- ④初期來台的外省人與二·二八的相關層面，如何正視及剖析是重要研究課題

2.國府中央的遷台～迄今應該先把何為本省人，何為外省人之真正內涵釐清才夠科學。

本省人 vs. 外省人：「外省人」稱呼之不夠科學與不合理，是人人周知之事，但鮮見有人士把它釐清是憾事。原本只是人類學概念的本、外省人概念之分，被政治符號化，甚至於促進了「外省人」的原罪觀之形成，這既是偏狹又危險之思考方式。對於「本省人」概念亦頗欠缺科學的定義，並不具備任何制約的疑似正當性主張，顯然是學界人士的怠慢。因而筆者才提出了「共犯結構」之概念。

我們中國人社會，當然包括新台灣人之社會，充滿了不結怨，更不該與他人結仇的「人生哲學」，抑或鄉愿式生活智慧。這一種鄉愿習氣的一般社會規範，一直阻礙著我們社會科學在這個社會中生根與真正發展。尤其在社會科學屬性的學術研討會中，人人仍然採取了只婉轉地點到為止，儘力迴避把問題點破為上之一種治學之道，是值得質疑的。筆者真不知，我們學術研究將如何展望，我們相應的發展前景在何？換句話說，我們社會科學的發展前景是堪虞的。如何善於分際人身攻擊（所謂的整人）與學術批判間之區隔，該是從事學術研究以前，必須釐清的前提性大工程。